

唐代射箭装备“胡禄”源流再考

负琰

(成都体育学院研究生院, 成都 610041)

摘要: 采用文献、文物、图像排比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将唐代射箭装备“胡禄”复归于整个欧亚大陆为背景的传播场域中, 考证其源流, 解析与建构其传播进程。研究认为: 至迟公元4世纪中期, 胡禄已出现在萨珊波斯。约公元5世纪, 胡禄传入中央亚细亚, 并在形制上发生了变化。随后, 胡禄由中央亚细亚传入突厥—蒙古草原地域。南北朝晚期, 胡禄传入中原。受波斯文化“西风东渐”的浪潮与中原地区“北朝系统胡化”双重文化张力影响, 胡禄在唐帝国实现了勃兴。

关键词: 体育史; 考古学; 传统射箭; 胡禄; 唐代

Re-exploration on the Archery Equipment "Hulu" of Tang Dynasty

YUN Yan

(Institute of Sport History, Chengdu Sport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so on, the paper puts "Hulu", a type of archery equipment in Tang Dynasty in the whole communication field throughout the Eurasia, meanwhile tracing back to its origin, analyzing and establishing its spreading process. The conclusions: "Hulu" had emerged in Sassanian Persia no later than the middle 4th century; about the 5th century, "Hulu" was brought into Central Asia, and got some transformations in its shape; after that, "Hulu" was introduced into Turk-Mongolia steppe; during the lat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Hulu" came to central region of China; being influenced by the eastward spread of the Persian culture and the systemic influence by northern minorities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Hulu became prevailing in Tang Empire.

Keywords: sports history; archaeology; traditional archery; Hulu; Tang Dynasty

“胡禄”是唐代对一种梯形束脖式筒形箭囊的专属称谓, 箭囊是盛装箭矢的重要器具, 因此, “胡禄”是唐代军事训练、仪卫出行、狩猎游艺的重要射箭武备。“胡禄”箭囊文物并不多见, 其形态则多出现于唐一代的壁画、石刻、石榻、陶俑、金银器皿等。对“胡禄”的研究是古代体育文物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胡禄”其名被冠以“胡”字, 因此, 学界对其源流的考据也众说纷纭。有学者考证为唐初经

西域传入中原; 有学者认为起源于西域龟兹; 也有学者认为起源于中亚撒马尔罕附近的边吉坎特; 更多学者采用一种宽泛的概念, 即胡禄源自外来文明, 由西域的马背民族传至中原, 并在崇尚胡风的唐代被普遍装备; 亦有学者认为源自古代草原突厥文化。虽然现有的成果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仍旧缺乏一个相对令人信服的结果。究其原因, 是因为考证胡禄的源流不仅要梳理一个出现时间的先后顺序, 更需要将不同地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5ZDB145)

作者简介: 负琰, 在读博士, 研究方向为中国射箭史。

域,不同时期出现的胡禄进行深度的文化元素解析。换句话说,一个令人信服的胡禄源流考还需进一步关注:什么人在使用胡禄;因何会使用胡禄;考古发掘中的胡禄图景到底隐喻了什么;从此地传向彼地的胡禄是否有蝶变、因何蝶变;所有考古发掘中的胡禄图景是否隐藏了共同的文化基因等一系列问题,即建构“器物”与“人文”的“互结与契合”。故而,重新梳理出一个在时间上与空间上都相对清晰的胡禄源流考,并进一步解析与构建胡禄的产生之源、传播之径、蝶变之因、演化之果,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课题。

1 基于欧亚大陆考古发掘的胡禄出现时间考

1.1 胡禄最早出现在中原地区的时间:南北朝晚期

“胡禄”为外来词汇,乃突厥语 Qurluq 的音译^[1]。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均可见诸多关于胡禄的记载。如“十量金花瓶子一,八量银胡禄带一,银火铁一”;“胡禄匠赵员子面貳豆斗”;“王怀智弓一并袋,刀一口,胡禄箭卅枝”^[2]初唐时期,胡禄就已成为唐府兵的制式武备。《新唐书》卷五十《兵志》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各一”。刻画有胡禄的唐代文物首推昭陵石雕之“飒露紫”(见图1),画面中正在为飒露紫拔箭的丘行恭腰间所佩戴的梯形束脖式箭囊正是胡禄。此外章怀太子墓《仪卫图》,昭陵《甲冑仪卫图》《战袍仪卫图》《狩猎出行图》,阿史那忠墓《侍者图》等唐墓壁画,均可见佩戴胡禄的唐人形象。上述壁画中佩戴胡禄的唐人多以仪卫出行、狩猎游艺的形式出现。以章怀太子墓《仪卫图》为例(见图2),壁画中的人物身穿圆领袍,头缠红色抹额(束发带),以蹀躞带(腰带)束腰身,左侧悬挂弯月形弓韬,右侧悬挂胡禄。其整齐划一的着装与队列显然是高级别武士的仪仗形态。^[3]经查

相关史料获知,胡禄本身正是唐军出行仪卫制度中的重要武备,《新唐书》志第十三上《仪卫志》有“每夜,第一擎擎,诸队仗佩弓箭、胡禄、出铺立廊下,按稍、张弓、捻箭、彀弩。”

“胡禄”既为突厥语 Qurluq 的音译,那么被冠以的“胡禄”这个称谓,其本身就值得解析。胡禄一名最早见于梁大同九年(公元543年)《玉篇》之《竹部》:“箛,音禄,胡箛,箭室。”说明至迟在南北朝晚期,胡禄就已出现在中原。可惜文献只释读了“箛”(禄),对于“胡”字却只字未提。此外,胡禄虽为突厥语的音译,但胡禄是否源于突厥,还须谨慎考证。如若厘清“胡”字在南北朝至唐这个区间中的语境,或能为本研究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有别于西周已降中原文明对四地“南蛮”“北狄”“东夷”“西戎”的称谓,“胡”字则不具备贬义的意蕴。这一时期“胡”字主要用以指代西方人,特别用以指代波斯人。虽然有时也将天竺人、大食人、以及罗马人都统称“胡人”。但与“胡”字对应的梵文字是“sul ī”,“sul ī”则来源于东伊朗粟特人衍生出来的“S ū lika”。在字意上指代东伊朗粟特人,引申为指称“伊朗人”^[4]。更应值得注意的是,“胡人”与“突厥人”在体质人类学中的分野是明确的。唐人颜师古在注《汉书·西域传》乌孙条目时谈到:“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猕猴者,本其种也。”颜师古所用“胡人”这一名称,当时无疑是指以今撒马尔罕为中心的索格底亚那地方人种,即伊兰(伊朗)人种^[5]。由此可见,南北朝至唐时期被冠以“胡”字的事物似乎蕴含着一种波斯文明西风东渐的映像。

隋朝时期,胡禄的形象出现在太原斛律彻墓的武士俑腰间^[6](见图3)。但综合目前的考古发掘情况,中原地区最早的胡禄图像当属北周安伽



图1 唐昭陵石雕“飒露紫”



图2 唐章怀太子墓《仪卫图》



图3 隋斛律彻墓武士俑

墓。墓室的石榻上，腰跨胡禄骑射猎兽的武士形象被清晰地呈现了出来（见图4）。

作为中原最早出现的胡禄图像，石榻背后的文化意蕴值得仔细解析。从墓志得知，安伽为粟特人后裔。粟特，汉文献称之为“昭武九姓”。粟特人属东伊朗人种，语言属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支。石榻画面中充满异域风情的对襟翻领长袍、琵琶、箜篌等事物，使整个构图呈现出浓厚的萨珊波斯艺术美感。主要体现在：

第一，狩猎图像在萨珊银器乃至萨珊艺术中是主要题材，其中表现最多的是帝王骑马射猎的场景^[7]。这种艺术形式体现在蜿蜒长梢的弓箭；脚尖尽可能朝向地面探直；坐骑与猎物都呈现高速奔跑的动感，双蹄至180度张开。

第二，图像中有两处茂盛的树纹，乃萨珊波斯艺术中常见的“生命树”纹样，笔者认为很可能是葡萄树。在萨珊波斯王朝的工艺品上，经常可见男女神像周围环绕着果实累累的缠枝植物，其中以葡萄居多^[8]。

第三，石榻上明显可见圣火坛图景。火坛周围弹拨箜篌、手持琵琶的天人与神祇带有明显拜火教的文化特征。该教被誉为波斯文明的脉搏，认为火是善神的儿子，象征着神的绝对和至善。因此，礼拜圣火是教徒的首要义务^[9]。南北朝时期拜火教传入丝绸之路北道的焉耆、高昌。约魏到齐、周时传入中国。

综上所述，安伽墓石榻这个中原地区最早的胡禄图像，其浓厚的萨珊波斯风情不言而喻。然



图4 北周安伽墓石榻

要做出胡禄源自萨珊波斯的推断，还需检视更多线索，以更为宏观的视野考察整个欧亚大陆考古发掘中的胡禄。

1.2 胡禄最早出现在突厥—蒙古地区的时间：公元6世纪

北亚草原的突厥系与蒙古系游牧民族常被统合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其原因在于：游牧与狩猎的基本社会形态；基于天神“Tengri（腾格里）”的崇拜；萨满为沟通天国与人间的灵媒；十进制的社会组织构架（杰克·威泽弗德）。突厥—蒙古的地缘结构大致相当于广义蒙古高原的范畴，即：东西延伸至兴安岭与阿尔泰山包裹起来的北亚腹地；向北延伸至贝加尔湖；向南延伸至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的楔形三角地带；在华北与大同盆地，燕云北缘相接^[10]。室韦部落被认为是蒙古人的祖先，在大致唐同期的谢尔塔拉室韦墓葬5号墓中（约7—9世纪），出土了用桦树皮制作的胡禄，可惜器身已经残破。在蒙古国国家博物馆里，陈列着13世纪蒙古时期用桦树皮制作的胡禄，同时期胡禄亦可见于世界著名射艺研究者，《百步穿杨—亚洲传统射艺》作者Stephen Selby先生的个人收藏（见图5），堪称保存最为完好的古代胡禄。

方以智撰《通雅》卷三五“器用”有：“一将军败，取障泥、胡禄修理食之，谓其皮物也”，说明正统的胡禄为动物皮质，而室韦、蒙古时期的胡禄却多为桦树皮包裹的木质结构。历史人类学的观点认为：最初形态的蒙古部落并非草原民族，而更像森林部落。与西部草原的游牧部落多使用皮质毛毡类物品不同，蒙古先民大量使用木车、木桶、桦树皮制品，居住在桦树皮搭的棚子里^[11]。每一种特定的文化类型都有其特定的环境基础，有学者干脆将北纬40至70度之间的北半球地区称为桦树皮文化带^[12]。因此，材质差异的原因便得到了相对科学的解释。



图5 Stephen Selby 珍藏的13世纪胡禄

更早的突厥时期，胡禄的图像广泛分布于以阿尔泰山为中心的突厥文化岩画上。如：哈密折腰沟岩画（见图6）、吉木萨尔西台子岩画、阔克霍拉岩画等，其时代约南北朝至隋唐时期^[13]。

以开发铁矿而崛起的突厥起初并不具备多少文明特质，能够迅速建立起横贯欧亚的草原帝国，得益于延续了匈奴以来的游牧民传统。即：联结西域的绿洲都市国家，广泛获取咨询、商贸、军需等战略资源。真正为突厥帝国提供统治支持的，正是东伊朗地区的粟特商人。在突厥的庇护下，粟特人建立了从到萨珊波斯到华北的商贸扩张网路。另一方面，他们为突厥人充当政治、商业、外交、咨询的顾问身份，内外两侧支撑着突厥人的统治机制。室点密可汗（？-576）在位时期，西突厥获得了索格底亚那（即粟特），不久又从萨珊波斯手中夺取了巴克特里亚。巴克特里亚与索格底亚那被认为是波斯文明发源地，代表波斯文明的拜火教便发源于巴克特里亚。这种统治力大致维系到统叶护可汗（618-630）时期，故突厥社会中的波斯元素更是显而易见的。

1.3 胡禄最早出现在中央亚细亚的时间：公元5世纪

与如今中亚作为行政区划不同，中央亚细亚乃文化地理学概念，亦可称为“中央欧亚”。东西大致为中国西北部至伊朗高原东部，南北从咸海北岸延伸到兴都库什山北麓。这一区域对文化史的贡献实为远大，东西文明的所有对话都基于此展开，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范围非常广阔，难以确定界限^[14]。

敦煌晚唐156窟壁画《张议潮统军出行图》；西魏285窟壁画《五百强盗成佛图》，均可找到胡禄的图像。公元7世纪早期，胡禄的图像出现在撒马尔罕古城遗址大使厅北墙壁画《唐高宗猎豹

图》。约与西魏285窟（开凿于公元538-539）同期，库车克孜尔洞窟224窟壁画《八王分舍利图》也出现了胡禄的图像。以上壁画中佩戴胡禄的人物多以骑兵的身份出现，以《五百强盗成佛图》为例，画面中的人物与战马皆身披重甲，呈现以冲锋前的蓄势待发状（见图7）^[15]。

综上所述的考古发掘，似乎都不能清晰地逾越公元6世纪。能否找到比公元6世纪更早的胡禄图像，并进行深入的文化元素解析，成为了推进本研究的关键。最终，在库车克孜尔洞窟114窟壁画《智马本生》图像上（见图8），我们找到了时间更早的胡禄形象（约公元4世纪末至5世纪末）^[16]。值得关注的，是壁画所隐喻的波斯文化元素。

1：前秦大将吕光约于公元382-383征服库车（龟兹），大致与开凿114窟的时间一致。库车留给吕光的，正是一种强烈的波斯风情。如现已证明起源于波斯的锁子甲，有“胡便弓马，善矛槊，铠如连锁射不可入”。也有风靡于古代波斯的葡萄酒酿制技艺，有“胡人奢侈，厚于养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经十年不败。”（《晋书·载记·第二十二·吕光传》）

2：《智马本生》中的人物元素—腰部收紧的紧身大衣、大翻领的对襟与高筒靴，脚尖垂直对地状，整套服装都是伊朗文化的^[17]。

3：克孜尔洞窟为何人所创作？厘清这一点，有助于我们从体质人类学解析壁画中的元素。在被称为“画家洞”的壁画上，我们注意到克孜尔艺术的创造者仍旧是一身伊朗系的装束。格伦威德尔曾解读出画家洞的铭文，其中有一个画家名叫“Mitradatta（米特拉丹达）”。很显然，这是一个希腊名字，确切地说希腊化的波斯名字，总不外是东伊朗人的一支，即吐火罗人。由于种族的



图6 哈密折腰沟突厥岩画



图7 敦煌285窟《五百强盗成佛图》



图8 克孜尔114窟壁画《智马本生》

亲缘关系，吐火罗人、粟特人与波斯人在语言、心理素质、风俗等方面的趋同便容易理解了。中央亚细亚最早出现的胡禄图景，似乎也隐喻着浓厚的波斯文化元素。

浓郁波斯风格的克孜尔壁画艺术一直传播到了西伯利亚地区。勒内·格鲁塞指出：克孜尔骑士的形象可以在米努辛斯克附近的卡拉攸斯谷底的苏拉克岩画中看到，亦可以在额尔齐斯河上游的谢米巴拉金斯克石柱上看到，库车是整个中央亚细亚波斯萨珊化影响的中心。根据格鲁塞留下的线索，笔者在西伯利亚地区米努辛斯克突厥岩画上找到了胡禄的形象（见图9），其年代约公元5-7世纪。以往来于欧亚大陆的粟特人为媒介，突厥地区的胡禄应为中央亚细亚的龟兹等地传入。

1.4 胡禄最早出现在萨珊波斯的时间：公元4世纪中期

几乎整个欧亚大陆的胡禄图像都充斥着浓厚的波斯文化元素。然除非以实物作为支撑，否则我们还不能轻易地做出胡禄起源于波斯的论断。令人鼓舞的是，在大英博物馆馆藏的沙普尔二世银盘上，公元4世纪中期的胡禄图像被清晰地呈现了（见图10）。银盘所彰显的艺术形式，代表了广泛分布与欧亚大陆的一种狩猎艺术表达的源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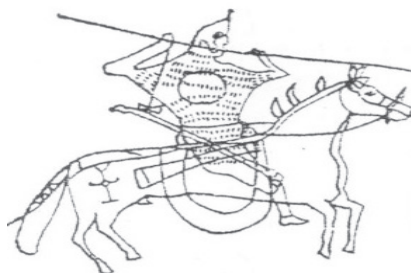


图9 米努辛斯克突厥岩画



图10 大英博物馆馆藏沙普尔二世银盘

上文所提到的北周安伽墓石榻便归属于这一艺术形式。与欧亚大陆东部梯形束脖状的形制不同，沙普尔二世的箭囊呈直筒状。本研究认为：直筒式才是胡禄的源流。

以往的研究困于形制差异的图囿，认为胡禄起源于他处，这恰恰忽视了胡禄在传播中的变迁，本研究的实质旨在厘清并解析这一变迁。众所周知，东西文明的相互传播必经由中央亚细亚。此地宛如水源流通的管道，介于发源地与下游之间。当文明传播至中央亚细亚的时候，由于特定的地域结构与人文特性，传播的文明或多或少地会有所影响。波斯早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就已经形成了相当先进的城市文明。中央亚细亚地区虽然很早便开出了渲染的绿洲都市文明之花，但其结构却深度的不稳定。在这片区域内，无数的绿洲城邦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上因自然环境、民族迁徙、战争等因素上演着“湮没-新生”的交替循环。此外，中央亚细亚的都市文明广泛分布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平坦通道，地理因素又加剧了这种不稳定性。为适应残酷的生态，中央亚细亚居民保有一种相当警觉的特性。投射到政治上，他们长期摇摆投机于欧亚大陆强势方之间。投射到武备上，胡禄由“直筒式”到“梯形束脖式”的变迁便应运而生了。变迁后的形制犹如早期的电话筒，具有收集声波的作用，这对长期迁徙的中央亚细亚居民尤为重要。用空胡禄卧于地，令人用作睡枕，可探听地四面八方的人马行动声^[18]。唐代李靖所著《卫公兵法·部伍营阵》有：“令人枕空胡禄卧，有人马行三十里外，东西南北皆响见于胡禄中，名曰地听。”综上所述，直筒式与梯形束脖式的差异并非两种不同事物的差异，实则起源于波斯的胡禄作为一种事物在不同场域内的变迁。

2 结论

至迟公元4世纪中期，胡禄就已经起源于萨珊波斯。公元5世纪，胡禄传入中亚亚细亚，特殊的地域结构与人文特性，使胡禄的形制发生了从“直筒式”到“梯形束脖式”的变迁。胡禄作为箭囊的同时，兼具收集声波的预警效用。由于北亚草原的突厥-蒙古系政权与中央亚细亚地区

在各个方面的交互影响,公元6世纪,胡禄经由中央亚细亚传入北亚草原地区,成为了突厥—蒙古系草原帝国的武备。胡禄传入中原地区的时间稍晚,约南北朝晚期,但却表现出异常的繁荣。这样的结果显然受到了双重文化张力的影响,即:波斯文化“西风东渐”的浪潮;肇始于公元5世纪的“北朝系统胡化”。盛唐时期崇尚胡风的文化达到了顶峰,胡禄在中原地区实现了勃兴。胡禄的传播媒介可以是多方面的:或通过种族的亲缘关系在伊朗语族之间传播;或基于粟特商人的中介作用;或通过战争、种族迁徙与物物交换。胡禄将古老的丝绸之路串联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共同体。

参考文献:

- [1] 岑仲勉.隋唐史(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222.
- [2] 黑维强.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中的外来词[J].敦煌学辑刊,2008(3):18-30.
- [3] 《中国墓室壁画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墓室壁画全集2:隋唐五代[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
- [4] 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M].吴玉贵,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34.
- [5] 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M].耿世民,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84.
- [6] 朱华,畅红霞.太原隋斛律彻墓清理简报[J].文物,1992(10):1-14.
- [7] 许新国.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J].中国藏学,2005(1):56-69.
- [8] 诸葛铠.“忍冬纹”与“生命之树”[J].中国书画,2007(8):90-99.
- [9] 韩伟.北周安伽墓围屏石榻之相关问题浅见[J].文物,2001(1):90-101.
- [10] 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M].黄美蓉,译.北京: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2016:24-25.
- [11]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M].蓝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77.
- [12] 于学斌.北方民族的桦树皮文化: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的汇通[J].满语研究,2006(1):113-121.
- [13] 任萌.天山东、中部地区突厥时期典型岩画分析[J].西域研究,2012(4):56-66.
- [14] F·B·于格,E·于格.海市蜃楼中的帝国:丝绸之路上的神与神话[M].耿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
- [15] 许新国.新发现的都兰吐蕃墓出土漆器[J].西部考古(第二辑),2007:232-242.
- [16] 王援朝.胡禄源流考[J].中国历史文物,2009(6):63-69.
- [17] 满莹莹.龟兹石窟波斯艺术元素与中外文化交流考论[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3(3):59-64.
- [18] 李怡.西安地区唐墓壁画中卫士常服考辨[J].文博,2003(3):61-64.

(编辑:夏涛)